

# 近十年国史学理论问题研究进展

孙钦梅

**[摘要]** 国史学理论作为对学科深层次的认识和反思，在国史学“三大体系”构建中居于重要位置。近十年来，国史学理论问题在中国历史学领域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领域内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已成为国史研究中逐渐趋热的学术话题和关注点，由此呈现出许多研究新成果和研究新思路，奠定了国史学科深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整体来看，当前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滞后于学科的整体发展和要求。未来要形成独具特色的学科理论研究模式，推动国史学“三大体系”构建并走向全面发展，应进一步强化国史研究的学科自觉和理论自觉，不断创新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关键词]** 新时代；国史学；唯物史观；国史分期；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

**[中图分类号]** 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5-0066-09

**DOI:**10.14019/j.cnki.cn31-1856/k.2023.05.015

对学科理论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是国史学争鸣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国史学界探索学科自身发展道路并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国史，又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新中国史、中国现代史或当代中国史，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当前已成为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门领域。国史学理论<sup>[1]</sup>是关于国史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所思考的是史学的发展问题，研究范畴很广，涉及的问题也很复杂。近十年来，学界对于国史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学科的指导理论、边界属性、历史分期、主流主线以及研究方法的创新等，一方面缘于这些问题是国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建设中重要、基本和关键的问题，对其研究和反思关乎国史学发展的全局；另一方面这些问题是近些年来研究者思想兴奋的焦点，同时又存在很多认识上的分歧。在上述问题中，学科边界属

性、历史分期、主流主线属于学科定位和基本问题，是国史学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指导理论与方法属于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是学科发展的灵魂和核心内容。同时，深化国史研究还要在坚持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根据学科的特点创新研究方法。

在较长一段时期里，国史学理论研究较为薄弱，甚至未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系统研究著作。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国史和“四史”学习教育等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国史研究迈上新台阶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引和根本遵循，国史学理论与整个国史学科一并进入一个全新时期。学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围绕上述基本理论问题从学理上积极作出新的认识和反思，形成广泛的讨论和争鸣，推动国史学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国史学科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

## 一、研究进展概要

学科的发展有赖于理论的支撑，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在1765年出版的《历史哲学》一书中

[1] 本文所探讨的国史学理论，不是历史过程中的具体理论问题，而是作为整体历史过程和整体史学的学科理论，即对有关国史学的思考，如国史学的史观、范畴、与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关系、历史分期、主流主线以及研究方法等。

指出，历史研究不应该只是堆积历史事实，它应该达到一种哲学的或理论的理解高度。<sup>[1]</sup>这里主要讲整体上理解支配历史的那些原则及意义的历史理论问题。国史学科建设也是如此。当前在国史趋向成为“热门”学科之时，其学科理论体系建设尤为重要且迫切。20世纪末以前，学术界系统论述国史学理论问题的文章尚不多见，一些史学工作者围绕国史学基本理论问题作了初步探讨，但总体来看比较薄弱，学科内涵、属性等均不够明晰，这严重制约了国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进入新世纪以后，学界开始关注到这一问题。不少学者提出：“仅仅满足于以揭示历史真相为治史归宿，而不重视历史学的理论建设，终究难以促进自身研究水平的提高。”<sup>[2]</sup>这样的观点也基本代表了当时及之后整个国史学界的认知。以李力安、朱佳木、程中原、田居俭、邹兆辰、关海庭等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学者努力从学科理论上探讨国史总体研究状况，为国史学理论和国史学科发展作出了有益探索。此后，国史学界逐步深入讨论国史的学科属性、定位、对象、指导理论与研究方法等问题，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国史理论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三大体系”建设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重大课题，国史学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关注国史学理论体系及对历史书写的影响，在深入阐释学科基本理论问题与创新研究方法层面取得若干重要进展，国史学理论自身也由此打开了新局面。

就国史学理论体系化的研究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sup>[3]</sup>是这一时期代表性成果，其出版改变了国史长期缺少系统理论与方法研究专著的局面，为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学理基础。朱佳木的《当代中国史理论问题十二讲》《历史经验总结与中国当代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研的若干基本问题》<sup>[4]</sup>，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国史学理论问题进行阐述，如国史学是什么学科、如何划分国史时期、如何看待国史的主线和主流、观察当代中国的基本方法有哪些，都是国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程中原的《信史立国：当代中国史研究纵横谈》<sup>[5]</sup>对国史学科的特点、历史分期、国史与党史的关系、当代人能不能写当代史等重大史学理论问题进行阐述，并就国史研究的方法提出一套新的较为系统的四重证据法，对于口述历史的理论与方法也有较深入的思考，是一部难得的国史学理论著作。宋月红的《新中国史实考论与编纂学研究》<sup>[6]</sup>及其主编的《当代中国史编研理论与方法论稿》<sup>[7]</sup>在理论上阐明了研究国史应该采取的理论方法和具体编纂的学理基础。也有针对专题领域的研究成果，如李文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刍议》<sup>[8]</sup>以中国当代社会史为研究对象，具体阐释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对象、学科定位、研究方法和资料特点。此外，李正华的《编刊余墨：当代中国史研究》<sup>[9]</sup>、卜宪群的《新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sup>[10]</sup>也涉及对国史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国史学理论以历史学理论为基础，若放眼整个史学领域，更有大量相关研究成果呈现。如于沛的《历史的慧眼：今天我们怎样读历史》<sup>[11]</sup>解读了当前为什么必须用唯物史观重新研究全部历史，以及研究历史的方法等重要史学问题。王

[4] 参见朱佳木：《当代中国史理论问题十二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历史经验总结与中国当代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研的若干基本问题》，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年。

[5] 程中原：《信史立国：当代中国史研究纵横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6] 宋月红：《新中国史实考论与编纂学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2020年。

[7] 宋月红主编：《当代中国史编研理论与方法论稿》，当代中国出版社，2020年。

[8] 李文等：《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刍议》，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年。

[9] 李正华：《编刊余墨：当代中国史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2020年。

[10] 卜宪群：《新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11] 于沛：《历史的慧眼：今天我们怎样读历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

[1] 徐陶：《当代哲学导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6页。

[2] 郑珺：《“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座谈会综述》，《光明日报》2001年4月21日。

[3] 宋月红、王爱云：《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

炳林等的《中共党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研究》<sup>[1]</sup>深入探讨了党史研究应该坚持的立场原则、采用的理论与方法、遵循的学术规范等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王晴佳、张旭鹏的《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焦点》<sup>[2]</sup>，从“人物、派别、焦点”三方面入手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当代史学在观念、方法和研究范围上发生的一系列显著变化。这些史学著论对于国史学理论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相关学术文章类研究成果更是推陈出新，因篇幅所限不一一枚举，但仍需指出其中呈现的研究新思路。主要体现在：一是从理论和方法角度提出国史或历史研究的新路径。如杨凤城提出要重视加强新中国史与整个中国历史包括近代史的接续、延续研究。<sup>[3]</sup>萧冬连指出当代史研究应当有一种大局观，具备贯通性思维、全球视野和整体史观照。<sup>[4]</sup>宋月红提出应加强国史通史研究，并提出国史通史的“八重”研究和编纂法。<sup>[5]</sup>金光耀提出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因素开展国史研究，“既要着眼过去又要放眼未来，既要立足中国又要面向世界”<sup>[6]</sup>。二是就加强史学理论自身体系建设提出新见解。如“中国历史哲学”“国史哲学”概念的提出，强调要在认识历史的基础上，研究历史的哲学命题。<sup>[7]</sup>瞿林东认为，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深入挖掘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并赋予新的内涵和现代表述，是理论研究的着力点。<sup>[8]</sup>于沛提出要构

建包括唯物史观、中国传统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新形态。<sup>[9]</sup>史学理论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研讨方向是，从学理上进一步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进行辨析与厘清，二者的概念内涵也从先前模糊认识中明确下来，即历史理论是指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史学理论是指历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宋月红认为，史学理论服从和服务于历史理论，历史研究特别是国史研究应把历史理论特别是国史理论研究和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重要地位。<sup>[10]</sup>也有观点认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并非那么截然分立，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再到当前重新整合的过程。<sup>[11]</sup>这些最新认知，反映了史学理论界对既有论题的深入讨论以及对新问题新视角的不断开掘。

## 二、关于国史学科的指导理论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史学研究中一个恒久的重要议题，也是当下国史学“三大体系”构建的基本前提。作为“唯一科学的历史观”<sup>[12]</sup>，唯物史观开辟了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全新模式，使历史研究具有了基本的遵循。国史学科建设取得很大进展，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国史工作者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开展研究。<sup>[13]</sup>基于唯物史观对历史进行研究，是长期以来史学工作者一贯秉持的准则。但一个时期以来，由于西方史学新史观的不断出现，史学界对其误解没有及时作正本清源的解释或给出令人信服的回应，以及在对待唯物史观的问题上存在教条化、僵化理解现象，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话语体系受到空前严重冲击，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也面临不断被边缘

[1]王炳林等：《中共党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2]王晴佳、张旭鹏：《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焦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3]杨凤城：《大历史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

[4]萧冬连：《谈谈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大局关照》，《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6期。

[5]宋月红：《论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的学理基础与方法》，《河北学刊》2019年第4期。

[6]金光耀：《新中国史研究三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

[7]参见李振宏：《关于建设中国历史哲学的初步构想》，《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宋月红：《论国史哲学与发展新时代中国学》，《河北学刊》2023年第3期。

[8]瞿林东：《理论研究与学科体系》，《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

[9]于沛：《〈史学理论研究〉三十年：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新形态的三十年》，《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

[10]宋月红：《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学科体系初探》，《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6期。

[11]顾晓伟：《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关系新解》，《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6期。

[1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页。

[13]有林：《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编纂当代中国史》，《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6期。

化的挑战。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有的领域中“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sup>[1]</sup>。有研究者表示，在一些研究成果中已经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的指导作用，也不再探讨有关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问题。<sup>[2]</sup>

如何加强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是近些年来我国史学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学界的努力下，唯物史观研究有了新突破。如刘森林《历史唯物主义：现代性的多层反思》通过现代哲学、科技等多个层面反观并论证唯物史观的科学性。<sup>[3]</sup>杨耕《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对“常识”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如历史决定论和意识反映论等进行新阐述。<sup>[4]</sup>聂锦芳等合著的12卷本《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通过版本考证、文本解读等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出新阐释，澄清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误读和曲解。<sup>[5]</sup>庞卓恒从“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论辩出发重新认识马克思发现和证明过的科学真谛。<sup>[6]</sup>吴英强调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历史叙事等方面着力重新阐释，提升唯物史观的解释力。<sup>[7]</sup>近年来国史研究的另外一个倾向是，呼吁整体史观的回归。随着史学界对“碎片化”研究取向盛行而造成的史学危机的不断反思，以及“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体系”“以整体史观

指导具体或碎片研究”<sup>[8]</sup>等主张的提出，这一问题逐渐引起国史学界的关注。程美东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提出，应重视从现代化、后馈性以及逻辑与历史的综合三个大历史视角考察国史，避免“碎片化”研究。<sup>[9]</sup>王爱云指出，国史研究应树立整体性综合研究的理念，注重长时段宏观研究视角。<sup>[10]</sup>易新涛认为，历史性、整体性、发展性这些原则作为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对推动国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sup>[11]</sup>

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是历史唯心主义，以唯物史观深化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批判成为研究者的基本共识。曲青山主编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文丛》<sup>[12]</sup>，李慎明、李捷主编的《还历史的本原》<sup>[13]</sup>，周兵主编的《历史虚无主义批判文选》<sup>[14]</sup>等几部研究论文集，以及朱佳木的《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sup>[15]</sup>、郭彦林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评析》<sup>[16]</sup>，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深入揭露历史虚无主义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基础，破解其理论谬误和陷阱。于沛从理论渊源上挖掘剖析历史虚无主义唯心史观的多重思想脉络，指出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是后现代思潮在今天中国的具体表现，应该认真剖析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sup>[17]</sup>宋月红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问题来源，指出当前国史研究重专题史甚或“碎

[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2] 邹兆辰：《关于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6期。

[3] 刘森林：《历史唯物主义：现代性的多层反思》，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

[4] 杨耕：《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5] 聂锦芳：《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全12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6] 庞卓恒：《坚持维护唯物史观的科学品格的必要性——从“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关系和含义的论辩说起》，《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5期。

[7] 吴英：《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思考》，《江海学刊》2022年第1期。

[8] 参见王学典、郭震旦：《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李金铮：《整体史：历史研究的“三位一体”》，《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9] 程美东：《从大历史的视角来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发展》，《兰州学刊》2012年第1期。

[10] 王爱云：《推进党史国史整体性研究，把握历史主流与本质》，《河北学刊》2019年第4期。

[11] 易新涛：《新时代深化新中国史研究的基本遵循》，《理论月刊》2021年第6期。

[12] 曲青山主编：《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文丛》3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2020、2023年。

[13] 李慎明、李捷主编：《还历史的本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14] 周兵主编：《历史虚无主义批判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15] 朱佳木：《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16] 郭彦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评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17] 于沛：《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片化”研究，轻通史性研究；重学科理论和方  
法，轻历史理论研究，由此导致在反对历史虚  
无主义上显得能力不足。<sup>[1]</sup>但也有学者提醒，在  
运用唯物史观同历史虚无主义斗争中还需要防  
止一些错误倾向，不能“无视历史发展过程  
中的客观史实，只看是否符合自己的‘史观’，  
只要不合自己的口味就贴上‘历史虚无主义’  
的标签”，认为这些做法既影响批驳历史虚  
无主义的效果，也不利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sup>[2]</sup>

### 三、关于国史学科边界属性

厘清学科属性及其与相近学科的界限，是  
任何一门学科持续发展的逻辑起点。国史学科  
性质特殊，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现实性，与党  
史、中国近现代史、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有着  
紧密的联系。经过学术界若干年讨论，其学科  
属性问题至今仍存有不同认识。普遍的观点认为，  
国史是与中国古代、近代历史研究相衔接，与  
党史研究相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历史学科。对于  
国史与党史之间的区别，学术界经过了一个长  
时期比较深入的探讨过程，认为国史与党史关  
于社会主义时期部分在研究对象、内容上虽不  
可避免地会有交叉与重合，但二者无论在研  
究角度还是研究重点、范围上都有很大不同，  
这种观点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sup>[3]</sup>近几年来，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不断深入。朱佳木认为，  
党史和国史的学科属性并不相同，即使在学  
科理论与方法上也有一定差别，前者更多地  
运用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而后者主要运用史  
学研究的方法。<sup>[4]</sup>党史学界对这一

问题也进行了反思，一些学者表示，党史研  
究也有限度，不能把党史研究的内容界定的  
过于广泛，甚至漫无边际，无所不包。<sup>[5]</sup>应  
该说，这种思考路径与国史研究在认识上是  
一致的。但也有人指出，类似上述观点强化  
了党史与国史在研究视角、范围、重点等  
方面的差别，事实上，党史研究对象和范  
畴涵括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的一  
切历史内容，党史与国史之间的学术区隔  
或学术边界已几近消弭。<sup>[6]</sup>

另有观点认为，国史研究是一门综合  
性学科，国史研究学科属性的综合性和多  
重性不仅不掩盖而且彰显其学科的基本属  
性。宋月红认为，“国史研究既属于马克  
思主义理论学科，又属于历史学和政治学，  
主要是这三种学科的集成和融合”<sup>[7]</sup>，“  
国史研究以历史学研究为基础，同时属于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政治学学科，而且  
国史各个方面的研究不仅是历史学，而且  
分属于相应学科门类”<sup>[8]</sup>。有人认为，这  
种观点看到了国史学科具有交叉性、融合  
式发展的特色，采取折中态度，并没有明  
确指出国史的学科属性。<sup>[9]</sup>对于国史学  
科属性定位问题，任贵祥在评论《中华人  
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中指  
出，书中几处对于这一问题的说法似有模  
糊和矛盾之处。“如果说国史属于历史学  
科，无须再讨论；如说它是一个独立的学  
科，如何加以界定以及与学科相关的一  
系列问题，则需要进一步论证和讨论”<sup>[10]</sup>，  
这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学术界在国史学  
科属性问题认识上的模糊性。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中共党史党建学  
被增设为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近期不  
少学者呼

[1]宋月红：《党史国史研究中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三个关键抓手》，《红旗文稿》2017年第6期。

[2]黄正林：《中共党史研究的史料与史学》，《党史研究与教学》2022年第5期。

[3]参见李力安：《当代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政治思考和现实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朱佳木：《国史研究的现状与前景》，《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1期；程中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回顾和前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5期；商翔：《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求是》1994年第9期。

[4]朱佳木：《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理论范畴与方法论》，《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0年第1期；朱佳木：《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当代史学科学理论建设》，《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7期。

[5]王炳林等：《中共党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北京出版社2021年，第52页。

[6]罗平汉、石瑶：《一级学科视阈下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3期。

[7]宋月红：《重视国史研究学科属性》，《中国社会科学报·专刊》2017年7月14日。

[8]宋月红：《论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的学理基础与方法》，《河北学刊》2019年第4期。

[9]储著武：《新时代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建设的思考》，《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2021年第6期。

[10]任贵祥：《国史理论研究的创新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读后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6期。

吁将国史纳入其中作为二级学科。如杨凤城认为：“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内部结构就要以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党的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尤其是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为基本支撑，换言之，它们构成一级学科中重要的二级学科。”<sup>[1]</sup>王炳林也建议把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作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可以考虑的六个研究方向之一。<sup>[2]</sup>以笔者浅见，国史学科虽具有多重属性特点，但其“史”的根本属性或本质属性是确定的。国史是一门历史学科，隶属于历史学范畴，这一基本定位也符合长期以来人们的通俗认知和理解。作为中国通史的当代部分，自然也不能缺少当代中国史的内容，否则将会造成“通史不通”。另一方面，就当前的具体研究实践来看，不少国史和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著作尤其是关于新时代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内容、话语叙述、研究范式等方面依然体现不出区别。学术界将党史、国史的关系比作两个“同心圆”<sup>[3]</sup>，意味着二者在研究范围上存在很大重合性。既如此，把国史与党史并列为中共党史党建学下的二级学科，无论是从学理上还是实践角度来看都缺少合理性。

#### 四、关于国史分期

国史作为正在不断向前延展的当代史，与中国近代史等其它史学分支学科相比，其分期问题更显复杂。国史分期主要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史作为中国通史部分的“断代史”在整个中国历史下的阶段划分及其称谓；二是仍然在延展过程中的70多年“国史”自身的具体“小时段”的历史阶段划分。关于前者，国内学界逐渐形成以1840至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认知或基本共识，由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即为“中国现代史”，或称“当代中国

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新中国史”。对于国史自身时期的划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国史学界一般都借用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四阶段的分期法。<sup>[4]</sup>之后陆续有学者提出国史与党史是两个各不相同的研究范畴，以新中国成立后党史的历史分期取代国史的分期并不妥当，于是又有“三分法”<sup>[5]</sup>“五分法”<sup>[6]</sup>等不同观点出现。

近些年来，对分期问题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如2009年朱佳木将国史以1956、1978、1992、2003年为界点分为五个时期。这一新的“五分法”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三个时期，合并纳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sup>[7]</sup>2021年他对这一分期法又进行了修正，将第四个时期的下限由2003年推后至2012年，并将2013年以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成熟和定型时期。这样的分期，体现出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文化大革命”虽然是错误的，但就其本质来说也是“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是“一种不成功甚至是失败的探索”。<sup>[8]</sup>《新中国70年》<sup>[9]</sup>即把改革开放前的几个犯错误时期和基本正确时期合在一起，放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来加以论述；<sup>[10]</sup>二是新时代在国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有别于前一个时期的明显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sup>[11]</sup>即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决胜全

[4] 参见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王幼樵、肖效钦主编：《当代中国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5] 参见葛仁钧：《论新中国的历史分期》，《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王德新：《对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探讨》，《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4期。

[6] 李彦宏：《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体系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1997年第9期。

[7] 朱佳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8] 朱佳木：《再谈国史分期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2期。

[9]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编著：《新中国70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21年。

[10] 朱佳木：《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当代史学科理论建设》，《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7期。

[11] 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21年。

[1] 杨凤城：《建好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时代价值》，《学习时报》2022年1月21日。

[2] 王炳林：《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探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3] 齐鹏飞：《关于“党史”与“国史”关系的再认识》，《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5期。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两章内容，以比较大的篇幅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叙述，突出了党和国家所取得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国史研究应该关注到这一点，加强对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为时代问题提供解答。

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问题的重要论述，当前学术界通常将国史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相对长时段的历史时期。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党的百年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其中，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这为国史、党史历史时期划分提供了重要原则依据。国史学界普遍认为，鉴于新时代在党的百年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对党史和国史进行分期，要将新时代独立作为一个时期来把握。李捷强调，新时代的伟大变革在新中国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sup>[1]</sup>他认为，新中国70多年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sup>[2]</sup>

这些在分期问题上的新观点，反映出新时代国史学界对历史发展特殊国情的新的认知和历史叙事话语。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分期的问题上，不管哪种划分方法都要以历史研究和实践上的“适用性”和“方便性”为目的，把握“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不能以一时一事的变化对历史进行简单分割，避免过于强调“差别”使国史研究陷入碎片化。

## 五、关于国史的主线、主流

史学界对国史的主线提法有多种，通常认为主线只有一条，如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建设和发展史<sup>[3]</sup>，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了实

现民族复兴而努力的探索史、奋斗史、创业史和发展史<sup>[4]</sup>等。这些观点并没有原则的分歧，只是表述上的不同。也有人认为国史的主线至少有三条：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sup>[5]</sup>程中原认为，“既是主线，应该是一条。主线的表述以能够概括全部历史的前提下越简练越好”，国史的主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开创和发展”。<sup>[6]</sup>

所谓国史的主流，即对发生过严重错误的时期以及整个新中国历史总体应当如何作价值评价，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 and 对待新中国历史上的曲折与失误。在主流问题上，学界主要强调了几点：一是要把历史中的失误、曲折与成就、本质加以区别；二是要把犯错误时期的错误与犯错误的时期加以区别；三是要区别历史上的失误、错误，有些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难以避免的。有学者认为，正确对待曲折和失误要有三点基本的判断：一是这些失误是探索中的失误。二是这些失误不应该发生，发生了则必须彻底纠正；三是这些失误并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不能因此全盘否定新中国的历史。<sup>[7]</sup>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这实际上是上一问题的具体或延伸。针对一些人认为改革开放前30年这段历史错误和失误是主要的这一现象，朱佳木指出，在评价历史时必须分清哪些是整体和本质，哪些是局部和现象，并把不同阶段联系起来看，不能把所犯的错误与犯错误的时期混淆。<sup>[8]</sup>张启华指出，从历史的整体来看，前30年成绩是主要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制度和物质

[1] 李捷：《新时代的伟大变革在新中国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人民日报》2022年9月9日。

[2] 李捷：《新中国史的叙事方式、问题把握与精神铸就》，《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3] 宋月红：《科学认识新中国史及其主题与主线》，《新湘评论》2021年第19期。

[4] 李安增、马付杨：《如何读懂新中国史》，《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4期。

[5] 朱佳木：《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的学科建设及当前任务》，《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年第5期。

[6] 程中原：《信史立国：当代中国史研究纵横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7页。

[7] 李捷：《新中国史的叙事方式、问题把握与精神铸就》，《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8] 朱佳木：《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理论范畴与方法论》，《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0年第1期。

基础都是在这一时期打下的。<sup>[1]</sup>当前,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统一说”居于主流地位。宋月红认为,深化这一问题研究,“需要围绕基本问题和前沿问题进行系统性与综合性研究,着力探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理论与方法论”<sup>[2]</sup>。

## 六、关于国史研究方法的创新

学术发展依赖于学科研究路径和方法的不断创新,这对国史学来讲尤为重要。十年来,国史研究采用多元视角对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行观察和思考,更着眼于打破学术壁垒,积极融入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而呈现出研究新气象。

(一) 跨学科研究方法。国史研究内容广泛,很多问题都与现实问题联系紧密,需要多元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不少学者指出,国史不单是一门政治史,而是涵盖着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法律史、制度史、思想史、教育史、科技史、管理史、医疗卫生史等诸多领域的丰富内容,必须多学科推进研究,形成多学科交叉的治学新路径。<sup>[3]</sup>萧冬连以改革开放史为例指出,在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逻辑方面,必须打破学科界线,进行多学科的对话,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研究成果丰富,历史学者不能无视这些研究自说自话。<sup>[4]</sup>行龙着重强调了从社会史视角对国史进行系统研究的重要意义,指出国史学界要重视从社会史的角度以“自下而上”的眼光开展国史研究,深化与丰富对国史研究的认识。<sup>[5]</sup>引入社会记忆史、心态史、情感史、身体史、影像史等新的研究视角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是近年来来的一个研究取

向,如从社会记忆变迁的角度,探析与改革开放相关的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记忆变迁<sup>[6]</sup>;借助情感史的视野了解历史中的情感如何影响了历史中的决策、如何触发了历史中的行为<sup>[7]</sup>等。这样的认识推动跨学科方法在国史研究中的具体实践运用,如引入心理学对“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分析该时期群众心理的种种特征,运用社会学有关学科理论深入考察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建设和社会变迁,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常见做法。这种学科之间的碰撞带动了学术的融合。

在跨学科研究逐渐成为一种学术风尚的情况下,学科边界或学科边缘问题引起史学界重视。2018年钱乘旦较早提出这一问题。他指出,“史学终究是史学”,“史学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就是严格依照能够得到的、坚硬的、真实的材料”,即做史学必须得从史料出发,以史料为依据。<sup>[8]</sup>宋学勤以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为例,进一步对史学研究的边界问题进行讨论,指出研究当代中国史相比于社会学等学科,学界有必要坚持其史学本位。在跨越边界去借鉴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之外,更有必要充分认识到本学科的独特价值。<sup>[9]</sup>

(二) 口述史学方法。口述研究方法既是收集和传播史料的方法,也是利用口述史料进行历史研究的方法。国史研究运用口述史学方法有着独特的优势,因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见证人尚健在。当前,口述史的内容几乎涉及国史的各个层面。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的口述史学,为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历史证据、研究视角与解释范式,但口述历史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却是当前国史研究面临的一个难题。近几年,不少学者开始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口述史学理论层面。受口述者生理、心理及社

[1]张启华:《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的辩证关系》,《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

[2]宋月红:《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6期。

[3]《弘扬北大革命传统,大力加强“四史”教育,跨学科协力开创“四史”教学研究的新局面》,《北京大学校报》2020年11月5日。

[4]萧冬连:《改革开放史研究需要多学科对话——以解释“中国奇迹”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5期。

[5]行龙:《从社会史角度深化国史研究的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5期。

[6]郭辉:《记忆史理论与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6期。

[7]王凜然:《情感史视野下的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8期。

[8]钱乘旦:《史学终究是史学——当代史学趋势漫谈》,《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

[9]宋学勤、李晋珩:《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议题与边界》,《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



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口述历史既包含真实，也掺杂口述者的主观成分，口述历史与历史真实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等，成为讨论口述历史真实性时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左玉河认为，“口述文本之真与历史之真之间有着较远的距离，中间有着多重阻隔，历史学家应该着力发掘记忆之真而减少记忆呈现的阻隔，无限逼近历史的真实”<sup>[1]</sup>。口述历史与当代中国集体记忆成为一个学术研究方向。如周晓虹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分析了经由亲历者口述的个体记忆能够超越个体的限制成为带有共同体一致的精神特征的集体记忆，以及集体记忆是如何建构起来的问题。<sup>[2]</sup>周海燕从搜集和使用的核心过程——叙事、阐释和对话三个层面讨论了口述史料的社会建构特征。<sup>[3]</sup>这些探讨推动了口述史学理论的完善，但仍缺少学界认可的较为统一的学术规范，有待进一步解决。

（三）“大数据”量化研究方法。国史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注重发掘数据在历史叙述中的作用，重视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21世纪以来在史学研究中兴起的大数据研究方法很快影响到国史研究，一些学者开始运用大数据方法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这一方法尤其兴盛于当代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在人口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运用。学者指出，这一研究方法有利于改变当前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为实现长时段、整体性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sup>[4]</sup>有人称这是史学量化研究的“再度崛起”<sup>[5]</sup>，甚至就是“计量史学”的复兴<sup>[6]</sup>。在这个意义上，大数据在国史研究中成

为一种全新的研究技术，不仅丰富了国史研究的资源，还丰富了国史研究的路径和方法。比如，关于概念史研究，以往研究者往往偏重引述文献以梳理概念的形成和流变，而借助大数据方法，则可对词频、用法等进行量化统计分析，以梳理概念含义的形成和流变。但也有人认为，大数据在技术问题以及史观、史德养成和史学理论完善等价值问题上对历史研究也形成多重挑战。<sup>[7]</sup>有研究者指出，在大数据带来的挑战和机遇面前，研究者无论如何也不能忘掉历史学的人文属性，不能放弃自古以来人类为了理解自我而摸索到的各种知识和方法。<sup>[8]</sup>

整体上看，十年来国史学理论研究跟随新时代的步伐前进，成果推陈出新，在学科属性、指导思想、主流主线、历史分期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认识不断深化，并达成一些重要共识。例如，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原典，加强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要重视大历史观和整体史观，拓展研究视野；要采用多元视角、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深化与丰富国史研究。上述认识，对于国史学科建设和发展无疑十分重要。但也必须认识到，当前国史学理论尚处在初步的基本理论、学术规范和方法体系建构过程，学科属性定位有待进一步厘清，学科理论特色不够突出，与国史研究的整体发展相比仍呈现一定的滞后性，这就迫切需要强化国史研究的学科自觉和理论自觉，通过学术上的不断探讨来进一步解决和深化认识。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研究”（21ZDA07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赵菲）

[1]左玉河：《历史记忆、历史叙述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

[2]周晓虹：《口述历史与集体记忆的社会建构》，《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3]周海燕：《史料、社会建构与行动：口述历史的三重理论向度》，《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4]马敏、薛勤：《大数据历史与新文科建设》，《新文科教育研究》2021年第1期。

[5]韩炯：《从计量史学迈向基于大数据计算思维的新历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1期。

[6][美]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著，孙岳译：《历史学宣言》，格致出版社，2017年，第120—121页。

[7]王冠中：《大数据对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挑战》，《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

[8]李剑鸣：《“大数据时代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笔谈——大数据时代的世界史研究》，《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